

·调查与思考·

农村劳动力外出与家乡住房投资行为

——基于广东省的调查

明 娟 曾湘泉

【摘 要】文章利用广东省迁移劳动力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实证结果显示,成员权利、身份认同与留守家庭福利提升等是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工住房投资与务工地就业状况、务工地生活成本显著相关。住房投资、回流动机等是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主要原因,但农民工汇款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有限。文章认为,就地城镇化、土地流转与住房置换、提升就业质量、建设保障住房等政策联动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农民工住房 家乡住房投资 农民工汇款

【作 者】明 娟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博士研究生;曾湘泉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

一、引 言

中国目前大部分农民工实际上仍处于“半城镇化”状态,仅实现了地域转移和非农化,而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无法在公共服务领域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在住房问题上也出现了双重消费矛盾:一方面,在流入地农民工拥有自有住房的比例很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仅有0.9%的外出农民工在务工地自购房,而大部分农民工居住在城市棚屋或城乡结合部的废旧房屋、农民出租屋或临时搭建房中,住房空间狭小、设施简陋,生活环境和卫生条件差,住房状况堪忧。另一方面,农民工在输出地进行住房投资的现象比较普遍,特别是翻建、扩建或改建老家住房。2005~2012年,农村新建住宅面积年平均增长5.6%,而农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由2005年的29.7平方米,增加到2012年的37.1平方米,年平均增加3.27%,比同期城镇居民高约1个百分点^①。但由于家庭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长期在外务工,这些住房的实际利用率不高,部分新建住房闲置或空置。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劳动迁移与农民工回流动态决策机制研究”(编号:10CJL029)的阶段性成果。

① 根据2006~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

在此背景下,分析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关键影响因素,探寻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住房政策联动机制,无疑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已有文献中关于国际汇款用途的研究发现,移民的汇款和储蓄在家乡大部分被用于非生产性投资,如建造和整修住房(Massey, 1987; Durand 等, 1996; Taylor 等, 1996; Adams, 1991)。移民为什么更偏向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研究者也从不同视角给出解释。一是基于新劳动迁移经济理论的分析认为,移民外出期间,仍是家中起决策作用的重要成员(Sturino, 1990),家乡的住房投资决策不是移民个体愿望,而是家庭联合决策,是家庭投资收益最大化行为,它可以为家庭提供直接和间接收益(Osili, 2004)。二是从身份认同视角的讨论,认为移民对家乡有较强的故土情结,希望通过维持与家乡的联系,强化其作为输出地成员的身份认同与得到尊重,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是一个常用的方式(Yeboah, 2003; Smith 等, 2009)。三是基于成员权利视角的分析认为,长时间外出的移民由于长期不在输出地居住,很少参加家乡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其成员权利越来越被淡化,在家乡建造住房,也是未来回流计划的一部分,为移民维持输出地成员资格提供稳固的基础(Barnes, 1974; Lawless, 1986; Mooney, 2003)。四是依据标准投资理论的探讨认为,移民投资的住房资产能提供一系列的收益,在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住房投资可能成为移民在家乡投资的首选(Besley, 1995; Akyeampong, 2000; Osili, 2004)。五是从利他主义角度出发认为,移民从本质上关心家乡发展,因为他们可以从家乡住房投资中获得效用(Osili, 2004)。不过,目前中国学者对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仍以农民工务工地住房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主(董昕、张翼, 2012; 郑思齐等, 2011; 郭新宇、薛建良, 2011; 杨俊玲、谢嗣胜, 2012),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胡枫、史宇鹏(2013)利用 2006 年北京大学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数据,讨论了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民工汇款投资用途(日常消费、大宗消费、农业生产、教育健康与创业投资等),其中对于住房的考察,是将其与自己或子女结婚、购买家电摩托等耐用消费品合并为大宗消费进行考察,并没有单独考察农民工在家乡的住房投资行为。仅胡建坤、田秀娟(2012)利用统计数据,检验农民收入与农民建房的关系,发现工资性收入对农民建房的带动作用大于非工资性收入,并未直接验证农民工外出与农民工建房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直接采用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的原因。

改革开放不仅使广东成为外贸大省、经济大省,更成为流动人口大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东仍为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其中跨省流动人口(户口登记地在外省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约为 2 150 万人,占广东常住人口的 20.6%^①。因此利用在广东进行的调查数据讨论外出务工与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将利用 2012 年 1 月在广东 21 个地市进行的劳动力转移情况调查数据,考察 3 个问题:一是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农民工在家乡的住房投资行为;二是农民工住房投资事件史分析,即从无住房

① 广东省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投资状态到住房投资状态转换的影响因素;三是住房投资对农民工向家乡汇款行为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华南师范大学劳动经济研究所 2012 年 1 月在广东省 21 个地市进行的劳动力转移情况专题调查。调查分为用工企业调查、外出务工人员调查、培训机构调查、用工地政府调查 4 个子项目,本研究使用外出务工人员调查子项目。经过整理剔除重复、部分数据缺失和第一次外出前已经新建住房的样本,最终获得有效分析样本为 1 456 个。

该调查数据覆盖了广东主要用工地区,且在发放中要求调查地区按照企业类型和企业

规模随机抽取企业填写。调查问卷涵盖外出务工人员个人基本状况、家庭及家乡状况、工作状况、培训情况、生活状况五类 80 个问题,调查内容详尽,有助于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引入足够多的控制变量来构造一种类似于实验的环境,获得关注变量的净效应。

(二) 描述性统计

1. 调查样本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

表 1 给出了调查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调查样本农民工大致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样本平均年龄约为 32 岁,新生代农民工(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16 周岁以上)约占总样本的 60%。分年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人数	百分比	变 量	人数	百分比
年龄			家庭承包耕地面积		
16~20 岁	68	4.67	1 亩及以下	780	53.56
21~30 岁	645	44.30	1.1~2 亩	420	28.85
31~40 岁	536	36.81	2.1~3 亩	70	4.81
41~50 岁	190	13.05	3.1 亩以上	186	12.80
51 岁及以上	17	1.17	家庭外出总人数		
性别			1 人	962	66.06
男	869	59.68	2 人	260	17.86
女	587	40.32	3 人及以上	234	16.07
首次外出年龄			家庭城市月消费		
14~20 岁	853	58.58	1000 元及以下	720	49.46
21~30 岁	539	37.02	1001~1500 元	451	30.97
31 岁及以上	64	4.40	1501 元及以上	285	19.57
受教育年限			回乡次数		
0~6 年	107	7.37	0 次	160	10.99
7~9 年	776	53.29	1 次	441	30.29
10~12 年	387	26.58	2 次	602	41.35
13 年及以上	186	12.86	3 次及以上	253	17.37
工作年限			年平均汇款量		
12 个月及以下	308	21.15	1000 元及以下	316	21.70
13~24 个月	237	16.28	1001~3000 元	163	11.20
25~36 个月	172	11.81	3001~5000 元	619	42.51
37~60 个月	394	27.06	5001~10000 元	226	15.52
61 个月及以上	345	23.70	10001 元及以上	132	9.07
是否有心理压力			是否有返乡意愿		
有	1075	73.83	有	632	43.41
无	381	26.17	无	824	56.59

龄段看,16~20岁占4.67%,21~30岁占44.30%,31~40岁占36.81%,40岁以上农民工仅占14.22%,远低于同期全国水平(《2011年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4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38.3%),可见广东用工结构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的格局仍未改变。而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民工以初中文化程度为主的结构没有改变,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34年,略高于初中文化程度。53.29%的农民工拥有初中文化程度,而高中或中专以上文化程度所占比重(39.44%)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7%)。

第二,就业呈现长期化和家庭化趋势。参与本次调查的农民工,首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1.28岁,到目前累计外出打工的年数平均为4.5年,外出3年以上者约占51%,大部分具有外出工作的经验,也积累了一定资金。从外出模式来看,农民工家庭平均外出人数为1.5人,单人外出仍是家庭劳动力输出的主要方式,约66%的农民工家庭仅有一人在外务工。不过,部分外出农民工已经夫妻共同外出或实现举家迁移,约18%的家庭有2个人在外务工,而16.07%的农民工家庭有3人及以上在外务工。

第三,城市融入困难,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调查显示农民工融入城市困难,73.83%的农民工在城市有心理压力,而家庭在务工地月消费水平约为1243元,约一半的家庭平均月消费在1000元以下。相应的农民工仍然与家乡保持紧密联系,在输出地仍保留一定的承包耕地,人均承包耕地面积约为1.796亩,接近59%的农民工每年回乡2次及以上,而农民工的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务工净结余被转移回了农村,农民工年平均向家乡汇款接近6000元。这可能促使他们选择最终返乡发展,调查也显示约43%的农民工已有返乡发展的计划。

2. 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情况

在总样本中有660人进行了住房投资,占45.33%(见表2),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现象较普遍。导致整体上出现这一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农民工住房相对购买力不足。在广东务工的农民工收入水平整体不高,2010年农民工工资水平约为1917元(孙中伟、舒玢玢,

表2 住房投资和未进行住房投资农民工特征比较

	总样本均值	住房投资	尚未投资	差值
年龄	31.98	34.61	29.80	4.81***
性别(男性=1)	0.5968	0.6682	0.5377	0.13***
婚姻(已婚=1)	0.6909	0.8318	0.5741	0.26***
受教育年限	10.34	10.23	10.43	-0.21
工作年限(月)	53.97	65.61	44.31	21.30
家庭16岁以下人数	1.17	1.31	1.05	0.25
家庭外出总人数	1.50	1.43	1.56	-0.13*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1.80	2.32	1.37	0.95***
村庄距乡(镇)中心距离(里)	9.80	8.97	10.49	-1.52***
村庄企业数量	2.68	3.06	2.36	0.70
城市月消费对数	6.98	7.00	6.96	0.05
是否有心理压力(有=1)	0.7383	0.7803	0.7035	0.08***
是否有返乡意愿(有=1)	0.4341	0.5167	0.3656	0.15***
年平均回乡次数	1.87	1.95	1.80	0.15***
样本数	1456	660	796	

注: *p<0.1, ***p<0.01。

2011),略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水平为1 690元),但远低于同期广东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水平(3 363元)^①。相对于农民工的低工资而言,同期广东房价持续上涨,2009年广东省商品房销售均价6 518元/平方米,创历史新高,涨幅达10.64%,2010年广东省商品房销售均价为7 479元/平方米,同比增长14.8%(广东省房协市场分析课题组,2010),最终导致了农民工住房相对购买力不足。二是农民工保障住房覆盖率较低。广东省作为流动人口第一大省,公租房建设迟缓,“十一五”以来,仅建有60多万套保障房,且大部分面向户籍人口。虽然有农民工可以申请公租房的政策,但申请过程繁琐,且面临各种附加条件,大部分农民工被排斥在制度之外(刘宏宇,2014)。

虽然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现象普遍存在,但农民工是否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仍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见表2),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1)已婚者、男性和年龄较大者倾向于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家乡住房投资者中男性和已婚者的比例要比未进行家乡住房投资者分别高13和26个百分点,而在年龄上,家乡住房投资者的平均年龄要比未进行住房投资者大4.8岁。可能的原因在于已婚者和男性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而年龄越大者外出时间可能较长,务工积累资金较多,加大了他们进行住房投资的可能。(2)家庭外出人数越多,在家乡进行住房建设的可能性越低。家乡住房投资者家庭外出总人数比未进行住房投资者低约0.13人。家庭外出人数越多,迁移家庭在城市生存能力越强,家庭永久定居的能力和意愿也相对较强,这会削弱他们在农村的住房投资行为,同时家庭外出人数越多,留守家庭人员数量会相对越少,家庭成员农村居住需求相对降低,这也会削弱外出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动机。(3)村庄交通便利、家庭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民工进行家乡住房投资的可能性越高。家乡住房投资者所在村庄距乡(镇)中心距离要比未进行家乡住房投资者近约1.5里。村庄距乡(镇)中心距离越近,农民工住房投资的价值及居住便利性越高,他们进行投资的可能随之加大。而人均耕地面积越多,农民工在家乡可得到的与成员资格相关的权利会越大,这种维持动机会强化住房投资行为。(4)农民工城市融入越困难,与家乡联系越密切,进行家乡住房投资的概率越高。家乡住房投资者在城市面临的心理压力、返乡的意愿及其与家乡的联系程度也高于未进行住房投资者。

三、实证估计结果

(一) 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决策

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受个体、家庭、输出地和输入地特征影响,我们借鉴 Osili (2004)关于移民家乡住房投资决策的分析框架,考察各因素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的影响。 Y_i 用来刻画移民在家乡是否进行住房投资活动,如果进行住房投资则取1,否则取0,采用 Probit 模型分析移民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可能性。具体公式为:

^① 2010~2011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

$$P(Y_i=1|X)=\Phi(X_i\beta)$$

其中,β 为变量估计参数,X_i 包括农民工个人特征(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家庭特征(婚姻、家庭 16 岁以下人口数量、家庭外出人数、家庭耕地承包面积)、输出地特征(距离乡镇中心的距离、村庄周边企业数量)、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家庭消费对数、在城市的心理压力、是否有返乡计划、与家乡之间的联系)。

从表 3 给出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年龄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有显著正影响。年龄每增加 1 岁,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概率将增加 1.2%;工作经验每增加 12 个月,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将增加 1.4%,结论与 Osili(2004)一致。表明农民工年龄越大、在外工作时间越长,农民工思乡、回乡的愿望越迫切,而住房投资无疑是他们在家乡获得身份认同和社会尊重的最好方式。从家庭特征来看,已婚者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概率要高于未婚者,这与移民生命周期理论相吻合,即已婚移民有更大的维持家庭生存的需要,在 30 岁左右,多数人结婚、组成家庭、养育孩子,这个阶段向家乡汇款首先是满足家庭这些基本消费需求。而家庭在城镇务工人数越多,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概率越低,外出务工总人数每增加 1 人,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概率将会减少 3.1%,主要原因可能是,多人或举家外出可能提升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能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使其融入城市或在城市定居的意愿更加强烈,进而影响他们在家乡的住房投资决策。另外,由于家庭在城市务工人数越多,家乡投资住房空置的可能就越大,其放松信贷约束等间接效应也大打折扣,因此,在农村住房没有交易市场的情况下,建房更多是基于家庭留守成员的福利提升。

在家乡人均承包耕地面积也与农民工住房投资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承包耕地面积每增加 1 亩,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可能性增加 2.4%。在现有制度约束下,老家的地和房子才是他们最后的依靠。我们看到,村庄经济发展程度对农民工住房投资有显著影响,村庄距离乡镇(中心)的距离每增加 10 里,农民工进

表 3 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决策(n=1456)

变 量	估计系数	边际效应
年龄	0.0305*** (0.0061)	0.012
性别(男性=1)	0.0965(0.0769)	0.038
受教育年限	0.0197(0.0140)	0.008
工作年限(月)	0.0029*** (0.0009)	0.014
婚姻(已婚=1)	0.3782*** (0.1074)	0.147
家庭 16 岁以下人数	0.0318(0.0452)	0.013
家庭外出总人数	-0.0772** (0.0304)	-0.031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0.0607*** (0.0137)	0.024
村庄距乡(镇)中心距离	-0.0110* (0.0061)	-0.044
村庄企业数量	0.0047(0.0048)	0.019
城市月消费对数	0.0289(0.0645)	0.011
是否有心理压力(有=1)	0.2127** (0.0828)	0.083
是否有返乡意愿(有=1)	0.2526*** (0.0736)	0.010
年平均回乡次数	0.0565** (0.0266)	0.022
常数项	-2.499*** (0.5796)	—
Log pseudolikelihood	-856.4	
Wald chi2(34)	248.9(0.000)	
Pseudo R ²	0.1460	

注:(1)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2)*p<0.1,**p<0.05,***p<0.01;(3)控制城市虚拟变量;(4)虚拟变量边际效应为从 0 到 1 的变化,工作年限、村庄距乡(镇)中心的距离、村庄企业数量的边际效应指在均值上变动 12 个、10 个和 10 个单位,其他连续变量边际效应指在均值上变动 1 个单位。

行住房投资的概率将减少 4.4%。输出地经济发展也反映了农民工维持成员权利的价值,家乡的发展预示着住房投资的未来收益,会促进农民工住房投资活动,而农民工也会为增强成员权利而扩大家乡的住房投资活动。这一点与董玄(2014)对浙江嘉善县外来农民工的调查结果相吻合,其调查发现,对农村宅基地、房屋升值的预期,共同导致农民工把积蓄投到农村、老家房屋而不是城市房屋。

从务工地工作生活特征来看,务工地消费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民工在务工地消费水平不高有关。在移民与家乡联系方面,平均回老家的次数每增加 1 次,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可能性增加 2.2%。这说明与家乡联系密切的农民工故乡情结更强烈,归属感或维持与家乡关系的意愿也更强,所以通过住房投资维持这种意愿的可能更大。而在城市有心理压力的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概率要比无心理压力者高 8.3%,有回流意愿者进行住房投资的概率也要比无返乡意愿者高 1%。这说明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与其在城市中的工作生活状态紧密相关,生活压力大,无法实现永久性迁移可能促使农民工不得不在家乡购房或者建房安家。而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将外出收入用于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为回流做准备。

(二) 住房投资事件史分析

上述 Probit 分析仅考察农民工在家乡进行住房投资的可能性,即投资是否发生,没有考虑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前的停留时间,这段停留的时间称为生存时间,在特定时间投资发生的概率则被称为风险率。风险期是从外出那一年开始,到住房投资的那一年结束,否则,风险期到调查时结束。被解释变量为风险比率,用来刻画 t 时刻移民投资的可能性,即从一种无住房投资状态到住房投资状态,依赖于农民工个人特征、家庭、流入地和流出地特征和流逝的时间。

参数回归中要求给出风险率与特征或生存时间与特征之间的关系,这就需要设定风险方程服从特殊的形式。而对于风险率的非参数估计可以看出,住房投资行为并不存在单调趋势,而是随着外出时间的增加,住房投资行为先增加,在 15 期左右达到顶点后出现下降趋势,而在 25 期左右下降到谷底,然后又出现上升。因此我们选择 Cox 比例风险模型来估计,Cox 估计对于风险曲线的单调性没有严格要求(Jenkins, 2005; Kirdar, 2007),并且估计参数解释可参照回归估计。

在 Cox 比例风险模型中,生存时间 t 的风险率 $h(t)$ 定义为: $h(t) = h_0(t) \exp(\beta_1 x_1 + \dots + \beta_k x_k)$ 。 $h_0(t)$ 为基线风险, t 为从首次外出到进行住房投资的时间。因变量不是单纯的住房投资是否发生,而是在某一特定生存时间内的投资发生率(即风险率)。自变量包括农民工个人特征(首次外出务工年龄、性别、受教育年限);家庭与输出地特征(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村庄距离乡镇的距离、村庄周边工厂数量);与家乡的联系及务工地宏观经济特征(就业状态、物价指数)。

表 4 估计了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风险, LR test 和 Score test 均显著, 说明模型拟合程度较好。而在 Cox 比例风险模型中, 变量的估计系数为正, 代表对住房投资风险有正向影响, 反之则表示对住房投资风险有负向影响。从估计结果可以看到, 年龄、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村庄发展程度对家乡投资风险均有显著正效应, 这与 Probit 估计一致, 进一步证实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更多地是为了维持社区成员权利, 而不是纯粹的利他行为。

考虑到宏观经济冲击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影响, 我们在模型中考虑就业状况和务工地生活成本的影响。农民工在外就业状态越好, 其返乡投资的动力或拉力会明显降低, 反之就业状况不佳或就业不稳定将会加速其返乡投资的进程。而就业状况我们使用广东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表示, 因为广东农民工就业大部分集中在加工制造业等外向型经济体, 加工贸易出口情况直接影响农民工的就业状态。对于务工地生活成本, 我们选用广东消费价格指数来代表, 务工地物价上涨有两个效应: 一是收入效应, 务工地物价上涨使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减少, 可能对家乡住房投资有负效应; 二是务工地物价上涨可能促使农民工将务工收入用于家乡投资, 因为家乡的货币相对购买力可能较高, 这会明显提升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务工地物价上涨对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影响要取决于这两个效应的冲减。

我们把这两个宏观冲击指标分别放入 Cox 比例风险模型中, 估计结果在表 4 中列出。从表 4 可以看到, 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与投资风险显著负相关, 这说明就业状况越好, 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稳定工作或实现持久定居的可能性越高, 这会削弱他们返乡投资住房的可能。而 CPI 与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风险也存在显著负相关, 可以证实物价上涨对外出农民工的可支配收入影响较大, 因为在持续工资增长机制缺位的情况下, 农民工工资调整缓慢, 物价上涨削弱了农民工对家乡的支持力度。

(三) 住房投资、回流意愿与农民工向家乡汇款

向家乡汇款是移民影响输出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Mamun 等, 2010), 探讨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 汇款成因及汇款用途是另一个不可忽

表 4 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风险率估计 (n=1456)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初次外出务工年龄	0.0234*** (0.0091)	0.0206** (0.0091)	0.0163* (0.0092)
性别 (男性 =1)	0.0775 (0.0858)	0.1335 (0.0862)	0.1152 (0.0858)
受教育年限	0.0604*** (0.0160)	0.0529*** (0.0161)	0.0540*** (0.0160)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亩)	0.0405*** (0.0074)	0.0410*** (0.0074)	0.0427*** (0.0074)
村庄距乡 (镇) 中心距离	-0.0112* (0.0067)	-0.0142** (0.0068)	-0.0150** (0.0069)
村庄企业数量	0.0018 (0.0040)	0.0033 (0.0040)	0.0032 (0.0041)
年平均回乡次数	0.0380 (0.0284)	0.0430 (0.0283)	0.0439 (0.0282)
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		-2.0491*** (0.3801)	
消费价格指数			-2.6146*** (0.4708)
LR test	15.792*	15.624*	15.099*
Score test	15.842*	15.206*	15.414*

注: (1) 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 (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3) 控制城市虚拟变量。

视的问题。我们以农民工年平均汇款为因变量,构建 Tobit 模型,来检验住房投资、回流意愿等对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即:

$$r_i=\alpha_i+\theta_1return_i+\theta_2hinvestment+\theta_3incident_i+\theta_4v_i+\varepsilon_i$$

其中, *return* 为回流意愿, *hinvestment* 为住房投资, *incident* 为过去一年中家庭是否有亲人病故或病重, *v* 为其他控制变量。

从表 5 可以看出,男性外出者向家乡汇款额明显高于女性,而受教育程度越高,汇款额越高,这可能与汇款能力有关。由于男性、受教育程度较高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具有一定就业优势,更有能力支持家乡住房投资。同时,家庭 16 岁以下子女数量越多,农民工汇款额越高,而村庄距离乡镇中心的距离越远,农民工汇款越少,这符合汇款的利己假说,即农民工汇款主要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家庭发展。家庭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对农民工汇款量的影响并不显著,说明目前农民工外出对于农业生产的支持十分有限,汇款很少被用于提升农业生产率等投资上,这也是目前外出务工导致农业生产率低下的原因。

表 5 农民工汇款决策估计(n=1456)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年龄	59.08*(30.71)	53.59*(30.669)	29.00(30.81)	29.01(30.81)
性别(男=1)	862.45**(392.02)	756.79*(392.50)	662.9*(389.6)	662.9*(389.6)
受教育年限	274.78*** (73.06)	293.9*** (73.14)	275.2*** (72.63)	275.1*** (72.69)
婚姻(已婚=1)	698.7(547.9)	642.1(546.50)	386.8(544.4)	385.59(546.1)
家庭 16 岁以下人数	1501.8*** (231.2)	1492.2*** (230.50)	1459.9*** (228.7)	1460.2*** (228.9)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72.13(52.98)	61.5124(52.94)	27.10(52.94)	26.97(53.14)
村庄距乡(镇)中心距离	-64.73** (26.98)	-62.75** (26.90)	-53.66** (26.72)	-53.66** (26.72)
年平均回乡次数	305.17** (136.22)	330.3** (136.10)	295.48** (135.12)	294.7** (137.8)
是否有返乡意愿(有=1)		1108.3*** (383.70)	920.1** (382.4)	919.54** (382.9)
是否进行住房投资(有=1)			1943.1*** (397.1)	1942.5*** (397.8)
是否有亲人病故或病重(有=1)				16.26(566.9)
常数项	-1916.5(1742.4)	-2449.5(1746.7)	-1807.1(1736.9)	-1805.8(1737.4)
LM test	494.4***	495.05***	495.63***	496.3***

注:(1)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2)*p<0.1,**p<0.05,***p<0.01;(3)控制城市变量。

另外,回流意愿对汇款有显著影响,有回流意愿者会加大对家乡的资金支持力度,而无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更容易被流入地吸收同化,倾向于在流入地进行财产性投资或消费,因此,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汇款动机要远高于没有回流意愿的农民工。同时,进行住房投资的农民工汇款更加积极,汇款额高于没有住房投资的农民工,平均高出约 1 943 元。由此可见,住房投资是农民工外出汇款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过去一年中亲人病故或病重等突发事件对农民工汇款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突发事件不是推动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主要原因。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广东迁移劳动力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行为。研究结果显示:(1)成员权利、身份认同与留守家庭福利提升等是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的主要原因;(2)农民工住房投资与务工地就业状况、务工地生活成本显著相关,务工地就业状况越好,生活成本越高,农民工进行家乡住房投资的可能性越低;(3)住房投资、回流动机等是农民工向家乡汇款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工汇款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比较有限。

由此可见,农民工家乡住房投资,是农民工在一定的制度文化条件下做出的理性决策,是居住需求、归属需要、认同与尊重需求等多重目标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时必须考虑农民工的多元需求,统筹流入地和流出地相关政策,设计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工住房政策的联动机制。

第一,把“就地城镇化”纳入城镇化战略范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满足农民工返乡居住意愿。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通过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引导农民适度集中居住,把公共服务向中心镇、村延伸,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均等化,让农民在当地过上现代化生活。另外,全面放开小城市落户限制,引导农民工在流出地中小城市购房,就地实现市民化。

第二,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村住房置换,把农民工从农村彻底释放出来,实现永久迁移。一方面,对耕地承包、农村宅基地等确权,赋予农民占有、使用、转让的权利,促进农村住房、承包耕地、宅基地等合理流转,解决农民工后顾之忧,也可以为农民工在流入地购房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可通过“宅基地抵偿部分房价”或者“农村住房直接置换城镇住房”等方法,实现农民工生活空间置换。

第三,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提升农民工就业质量,增强其在务工地城市的住房购买能力。一方面,及时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保障农民工的底线工资;另一方面,完善劳资集体协商和谈判机制,通过集体谈判的形式来确定工资水平和工资增幅,逐步建立农民工工资增长长效机制,提升农民工城市住房购买能力。

第四,加大农民工保障性住房建设支持力度,在资金、政策等方面应重点倾斜。一方面,将农民工住房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加大保障房建设和供给力度,放宽申请条件,保障房政策更多向农民工群体倾斜,逐步建立“农民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商品房”四位一体的住房保障体系;另一方面,逐步建立适宜的农民工住房补贴制度,把农民工纳入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之内,给他们提供稳定的资金,保障他们住房购买基本能力。

参考文献:

1. 董玄(2014):《现阶段农民工回家乡购房和建房的制度性原因》,中国经济新闻网,2月17日。
2. 董昕、张翼(2012):《农民工住房消费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10期。
3. 广东省房协市场分析课题组(2010):《2009年广东房地产市场分析报告》,广东房地产网。
4. 郭新宇、薛建良(2011):《农民工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12期。

5. 胡枫、史宇鹏(2013):《农民工汇款与输出地经济发展——基于农民工汇款用途的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2期。
6. 胡建坤、田秀娟(2012):《农民工回乡建房行为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12期。
7. 刘宏宇(2014):《公租房申请手续吓跑农民工:至少需办7个证等90天》,新华网。
8. 孙中伟、舒玢玢(2011):《最低工资标准与农民工工资——基于珠三角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8期。
9. 杨俊玲、谢嗣胜(2012):《农民工住房现状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第1期。
10. 郑思齐等(2011):《农民工住房政策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第2期。
11. Adams, R.H. (1991), The Economic Uses and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in Rural Egypt.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9(4), 695-722.
12. Akyeampong, E. (2000), Africans in the Diaspora: The Diaspora and Africa. *African Affairs*. 99(395), 183-215.
13. Barnes, S. T. (1974), Becoming a Lagosia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14. Besley, T. (1995), Nonmarket Institutions for Credit and Risk Sharing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3), 115-127.
15. Durand, J., Kandel, W., Parrado, E.A., and Massey, D.S. (199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exican Communities. *Demography*. 33(2), 249-264.
16. Jenkins, S.P. (2005), Survival Analysis, Unpublished Lecture Notes Manuscript. *Institute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Research*. University of Essex.
17. Kirdar, M. (2007), Labor Market Outcome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tur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Immigrants in Germany,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in Its Series ERC Working Papers No.0703.
18. Lawless, R. (1986), Return Migration to Algeria: The Impact of State Intervention, Return Migr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Problems, Edited by Russell King. London, England, Croom Helm, 213-242.
19. Mamun, K.A., and Nath, H. K. (2010), Workers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in Bangladesh. *Journal of Business Strategies*. 27(1), 29-52.
20. Massey, D.S. (1987), Understanding Mexican 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2(6), 1372-1403.
21. Mooney, M. (2003), Migrants' Social Ties in the US and Investment in Mexico. *Social Forces*. 81(4), 1147-1170.
22. Osili, U.O. (2004), Migrants and Housing Investment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Nigeri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52(4), 821-849.
23. Smith, L., and Mazzucato, V. (2009), Constructing Homes, Building Relationships: Migrant Investments in Hous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100(5), 662-673.
24. Sturino, F. (1990), Forging the Chain: A Case Study of Italian Migration to North America, 1880-1930, Toronto: Mult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Ontario.
25. Taylor, J.E., Arango, J., Hugo, G., Kouaouci, A., Massey, D.S., and Pellegrino, A. (199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Development. *Population Index*. 62(3), 397-418.
26. Yeboah, I.E. (2003), Demographic and Housing Aspects of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Emerging Urban form in Accra, Ghana. *Africa Today*. 50(1), 107-119.

(责任编辑:朱 犁)